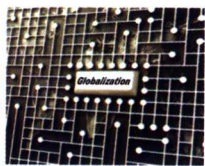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IRD WAY

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

主编：程光泉



郑伟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

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IRD WAY

学术顾问：袁贵仁 韩震 丰子义

主 编：程光泉

郑 伟 著



西安政院201 2 3136409 6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郑伟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7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程光泉主编)

ISBN 7-5438-3365-4

I.全... II.郑... III.①社会制度-研究②社会民主
主义-研究 IV.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5543号

责任编辑:张 莉
装帧设计:陈 新

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

郑伟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5

字数:285,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3365-4

C·150 定价:27.00元

总序

一个幽灵，一个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各地徘徊。建立在道德和幻想基础上的乌托邦业已破产，建立在金钱和利益之上的乌托邦升出了地平线。在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大门口，政治家和跨国公司的老板用镀金的字体，联手写下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一年多以前，我在哲学课上与学生讨论全球化问题时，一个同学给我写下以上的话。全球化的话语如此普及，乃至可以模仿马克思的口吻来宣布一个时代的主题，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怀有相同的期待与焦虑，认为自己已经和正在经历社会的重大变迁，并进而深刻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又逢世纪之交，人们又在忧心忡忡地思考我们时代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①“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全球化(Globalization)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和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关键词。“‘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第2页，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同上书，第4页。

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的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一个人来说，‘全球化’都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①

的确，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国外全球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达到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全球化思潮。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国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进行得略晚一些。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绕全球化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球化成为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开始越出学术界，成为政界、经济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必将引起我国学界和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我国出版界对全球化问题的介入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目前已有多套丛书面世，这些书目主要是国内学者的论文结集和译介国外相关著作。为了改变学术界主要以初步研究成果和译著为主的局面，化情绪化的表达为深入的学理探究，更全面反映我国学术界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解答人们面对全球化的疑虑和担忧，应对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在学界凸显中国学者的声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1页，郭国良、许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音，我们决定就全球化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编写这套大型学术专著丛书。丛书设计了八个方面的选题：全球化与现代性、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文化整合、全球化与经济安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我们认为这八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当前全球化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与现代性》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扭结，难分难离。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涉及我们对全球化本质的把握。全球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现代性（Modernity）一种世界性扩张，将现代性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学者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乌·贝克、罗伯逊等。吉登斯认为“时空的延伸”是使得跨越遥远时空距离的人类活动能够稳定地组织起来，这是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时空的伸延”大大地延伸了社会关系的距离，使得复杂的全球关系网络得以形成。因此，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一地发生的事情受到千百里以外的事件的塑造，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地方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沿着与塑造它们的伸延很远的关系相反的方向运动。地方性的变迁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社会联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旁向延伸。”^① 根据这一定义，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世界沿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市场经济、监管、军事秩序和工业主义）的扩展。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视野，就会看到，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的自由、民主、理性、市场经济制度等，也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与现代性是同卵共生、相互形塑的。

^①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 64. 1990.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为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的因应之策。“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末西方中左翼政党提出的一种新的施政纲领，它与以往欧美流行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不同，它不是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不涉及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它实际上只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次改良。它对诸如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社会公正、积极的福利政策、个人的权力与责任、风险防范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并对自己的施政纲领做出相应的调整。冷战的结束也使西方国家成了“没有敌人的国家”或者“不知敌人在哪里的国家”，“第三条道路”正是试图为这种国家提供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它不仅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更有一系列操作性很强的政策和措施，有的理念甚至渗透到个人生活的“私域”之中。这一理论特别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所鼓吹，因而名声大噪，近来虽有式微的迹象，但作为一度称雄的理论的确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厘清《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全球化，从西雅图到达沃斯，从曼谷到热那亚，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反全球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全球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与国际化之间没有差别，全球化就是国际化或区域一体化。这种声音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了；二是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全球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进程。它既可能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在一些人眼里它又是价值观的、规范性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利益对全球化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作为一种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十分复杂。如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恰恰是美国的工会的人士。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反对全球化，落后的第三世界也反对全球化。这就需要梳理，在复杂的反全球化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同群体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和推动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多样性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化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新问题；追求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成为各种地域文化形式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研究《全球化与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探求先进文化建设之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亨廷顿一篇《文明的冲突》引发了全球学界、政界的滔天巨澜，在世纪之交无数的冲突中人们从中隐隐约约地发现了文化的影子。在众多的诘问面前，亨廷顿不解地问：“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实体。如果不带偏见，亨廷顿的分析至少在现象层面上是有道理的。至于更深层的冲突由何而起，我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整合与发展。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温情脉脉的文化整合的背后，价值的冲突却以血与火的形式上演着，《全球化与价值冲突》的关联日趋明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价值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表现形式也异彩纷呈。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其核心是价值冲突。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甚至以武装冲突的形式肆无忌惮地表达西方的价值理念。东方主义与亚洲价值观的式微使传统价值观前景堪忧，也直接影响到其民族利益的表达。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的困境，是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这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现实的价值选择和主导价值的确立亟待理论研究为之开辟道路。一位外交家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然而许多战争都恰恰是用这些宗教的名义进行的，一个简单的解释似乎是，竞争促使人们力求比邻居过得好一些，尽管神灵要求人们帮助邻居。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再没有比表现在我们运用的一套价值

观上那么强烈了”。^①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各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不同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含义，世界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②。

作为一对尖锐的矛盾，表面看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似乎势不两立。客观地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国家首当其冲，全球化从根本上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而追根溯源，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性经济造成了国家的政治机构以及国家的经济控制政策与必须控制的国际经济力量之间的根本性分离。“全球经济创造出了一个不再是以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地缘经济力量主导经济政策的世界。”“国家政府管理控制企业的时代结束了。”^③ 全球化的本性是不尊重国家主权，甚至要求摧毁一切国家主权而建立无国界经济乃至无国界政治，而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谋求发展，又要维护和伸张国家主权，这就构成一对矛盾。虽然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却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问题、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国家的职能问题、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已经变得炙手可热。

“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十分流行的警句，它说明了无论全球化进程有多快，普及程度有多高，我们都必须从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从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中清

^① （丹麦）奥斯特罗姆·莫勒：《全球化危机？》，第256页，贾宗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

^② 同上书，第258页。

^③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123～125页，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醒过来的人们，看到了全球化狰狞的另一面。相对于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经济安全更为基础。我们既要构筑防火墙，又要建设防波堤。基础性的经济安全将保证国家在全球化的漩涡中心而不至沉没，也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被边缘化。我们在热情拥抱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忘记《全球化与经济安全》的问题。

行驶在全球化惊涛骇浪中，人类的“泰坦尼克号”如果不至沉没，并力求到达彼岸，就需要治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一次结构性的转型——从两极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有的学者把它总结为三种趋势：地区和全球性国际制度和组织的持续和迅猛的增长；跨国社会运动以及非政府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决策程序、政策和行动的不满；深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不满之中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复兴。^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在全球层次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但传统的治理方式局限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治理是超越传统治理理论的新课题，原有的治理理念面对新的现实的攻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应引起全人类的深入思考。

全球化进程与理论的开放性，决定了我们在本丛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当前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相信全球化已经并将会带来更多的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会变得更为开阔。本丛书关注全球化理论本身的深入探讨，也关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出来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全球化理论，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全球化问题会有一定的研究阈限和固定的研究模式。因此，整体看来，这套丛书尊重每位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而不是强求一律。

^① 转引自《没有政府的治理》译序，第2页，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对全球化，人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也就有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见仁见智，本不足奇。但人们在对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不是进行事实分析，而是急于作价值判断，这本身也是不严肃的。我们不愿在诸如全球化的定义之类问题上停留，也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对诸如欢迎还是拒绝全球化，现实是全球化的危机还是全球化的神话，全球化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全球化是当下的进程还是古已有之，是发展趋势还是已经终结等等问题，我们不要求做过多的分析。诸如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本身的复杂性和随机性，决定了全球化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不确定的。一个事物对一个国家是机遇，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危机。今天是机遇，明天可能就变成了挑战。再如，多数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双刃剑，具有双重性。令人疑惑的是，什么事物的性质是单一的？又有什么事情的作用不具有双重性呢？在全球化的研究中，类似的似是而非的观念令人费解，也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全新的问题面前，我们的运思方式和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是否亟待更新。我们力图在这套丛书中引入一些新的分析方法。结果如何，还待读者检验。

本丛书得以出版，要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熊治祁社长的大力支持，更要感谢丛书策划与责编张莉女士的辛勤劳动，没有她的一再督促，这套丛书的完成可能遥遥无期。同时，几位学术顾问对丛书的关心和指教，也令我们没齿难忘。

程光泉

2003年1月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Abstract

In the late period of 1990's, the theory of "the third way" began to spring up in the western world. Some of left-centre parties regarded it as the basis of their theory and the creed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after Cold War,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the left-centre parties and theorists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made a theoretical choice and made a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n how the western parties won the support of electorates.

Beyond left and right is a distinct character of "the third way". But it doesn't seek for the middle road between left and right. Beyond left and right it tries to rebuild a "radical politics". The radical politics includes the main contexts such as:

On the political outlook, "the third way"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relatively systemized political theories. It claims tha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sovereignty of state-state is impacted to a certain degree. But the condition doesn't mean that the state power is decreasing, in contrast, the state power is widened. "The third way" brings forward "emancipatory politics" and "life politics"; claims that politic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eal-life problems. Aiming at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western democracy system, it puts forward the concrete conforma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e change of th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it adjusts the electorate basis and makes the society democracy party enlarge the effect on the middle estate.

On the economic outlook, "the third way" tries to search for a

kind of the reasonable tensile force betwee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adjustment. State and government must take on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state macro-control. As far as the concrete management being concerned, state lets proprietors manage in the market all by itself and does not control it too much. Abandoning the pursuit of public-owned system, it transforms the mixed economy between traditional public-owned system and private system into “new-patterned mixed economy” which combines state intervention with market adjustment.

On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it claims that the safety net patterned welfare state in which state is the whole show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society investing state. State should mobilize all the social aspects to invest social welfare and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state should combine welfare and employment wi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uild a positive system of welfare system. In addition, it decreases social members' dependence on welfare system and makes persons build up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It combines rights with responsibilities and emphasizes that no responsibilities means having no rights.

On the social outlook, “the third way” emphasizes it important that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set up cooperative and companionate relations. It requires that state cultivate positive civil society and rebuild community and family, mak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mmunity and family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of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together. On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 it requires that state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avoid the old road of first pollution then administration, regard the administration of environment as an important problem. Meantime, it claims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should enforce collaborat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etc.

导论 “第三条道路”：西方中左翼政党的理论选择和政治变革

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西方开始兴起，并被一些中左翼政党作为理论基础和施政纲领。“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绝非少数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或标新立异，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现实的社会基础的。从理论上来说，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在当今世界冷战结束以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于西方政党如何赢得选民的支持所做出的一种理论选择和政治变革。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首先与当今时代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的结束。这两个方面，对西方政党的执政纲领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方面，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各种全球性机构不断出现，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加强，以及国际间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都标示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趋势。经济的全球化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它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问题、国家的职能问题、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等，都需要各国执政党从理论上做出相应解释和回答。西方中左翼政党，从这种现实背景出发，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并对自己的施政纲领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迫切需要执政党提高管理风险的能力。吉登斯说，全

球化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三条道路”理论，就是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

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也需要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对其政策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空前的挫折，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抗相互抵制的冷战思维，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前提。这就需要西方国家对自己的国际国内政治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变革。冷战的结束，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东西方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的障碍，但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冷战时代结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了。在冷战时代，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把很大的精力用在如何遏制和抵御社会主义的威胁上，人们的注意力主要指向外部，从而忽视和掩盖了各自国家内部的问题。当社会主义的威胁消失以后，他们又重新把目光转向自身，现实地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以便重新获得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对此，德国前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封丹进行了分析。他说，在原先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西方的“民主政体国家”可以通过与前苏联等东方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的对比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显示自己的优越性。而现在，“人们则必须用对他们内部的要求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民主政体国家，从他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他们是否没有辜负其民主政体”。“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西方中左翼政党对自己的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引言第5页，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政纲领进行调整的产物。对此，吉登斯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重要目的在于，为“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

其次，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如何看待和评价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成为西方当代社会民主党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有的学者面对这种状况，做出了悲观的结论，如英国的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等人得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终结”的结论。达伦道夫说，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命运，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变种都不可能再从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双重噩梦中苏醒过来的世界上复活”^①。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自我瓦解进程”，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则是因为自身的“成功”而走向终结的。在他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努力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正是这一点使得自己成为多余的。由于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所以工人阶级人数减少，工人们越来越渴望个人自由流动而不是集体前进。因为福利国家为全体民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健和福利条件，所以对于那些现在渴望更好的选择、独立和自主的人们来说，国家和官僚机器已成为重负。达伦道夫认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融入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而不是经常被直接拒斥。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和事业，其能量已经大量消耗。^② 面对社会民主主义进入低潮的现状，西方社会民主党是固守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或自甘于沦落为西方普通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还是对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策略进行重新调整，以适

^① Dahrendorf,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0. P58.

^② (英)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第85页，姜辉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

应当今世界新的时代的变化呢？它们显然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即迎接挑战，反思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和纲领，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进行创新，以全新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努力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为此，它们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并把它看做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惟一道路。

最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演变也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左派力量的主要代表——社会民主党，由于采取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措施，使当时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缓慢、失业人口增加、社会贫富差距显著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和缓解，从而赢得了西方民众的支持，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在多个西方国家持续执政的局面。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管理模式陷入了危机，而福利国家积累的弊端也成了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问题，左翼政治模式因此而受到普遍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右翼势力的主要代表——保守党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在大选中相继击败左派政党，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执政历程。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保守党的政策弊端也暴露出来。左派的路线早已失灵，右派的政策也开始受到批判。人们开始厌倦在左与右之间反复进行选择了。西方社会民主党适时地采取了超越左与右的策略，既不简单地重复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老路，也不继续新右派的政策，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它们纷纷对自己的政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扩大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更多地关心诸如就业、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教育培训等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几年的努力，在欧洲出现了多个国家社会民主党同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局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粉红色的欧洲”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时期。“第三条道路”理论也随之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社会政治思潮。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如传统社